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〇三期 ——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7c)

【千秋功罪】	刘少奇文革命运的悲剧性	萧 象
【当事者说】	李雪峰专访：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 ——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	李海文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六）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千秋功罪】

### 刘少奇文革命运的悲剧性

• 萧 象 •

刘少奇至迟不晚于1966年5月中旬，也就是中央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之时，就察觉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整肃自己的权力图谋，感到自己要挨整了。这是笔者在《刘少奇是什么时候感到自己要挨整的》一文中得出的认定。这一认定的得以成立，使刘少奇文革初期的政治行为更具一种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剧况味——在明知文革运动冲己而来的情况下，逆来顺受，躬身迎合，最终被这一运动所吞噬。刘少奇这一近乎灯蛾扑火式的悲剧性行为让人想起苏联的布哈林，布哈林也是明知自己蒙冤无罪而走向祭坛引颈就戮的。惟不同者，刘少奇之文革命运与整个民族与国家的命运有着更为直接紧密的关联，其悲剧反映的不独为个体的荣辱生死，更是民族与国家的兴衰治乱。因此，我们愿意以此（刘少奇感到自己要挨整了）为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分析并揭示刘少奇文革命运所呈现出的巨大而深刻的悲剧性。

1966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标志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通知》中最后一段被视为画龙点睛、也是最为要害的文字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其中指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正是从这段文字刘少奇敏锐而不无栗惧地感到了毛泽东的权力图谋，感到自己要挨整了。

这种感觉来自于刘少奇与毛泽东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矛盾斗争、尤其是62年以来与毛尖锐冲突所形成的本能反应，同时也来自于权力中人特有的政治敏感与判断。几十年党内激烈斗争中脱颖而出的经历，会议期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捆绑打成反党集团并受到的激烈批判，以及会场外邓拓和田家英与此不无关联的相继自杀，这一切都在告诉刘少奇，此次运动来势凶猛，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次运动，毛泽东此回绝对来者不善，自己恐是大难临头，凶多吉少。

面对整肃来临，政治生命岌岌可危，刘少奇是怎样的反应，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根据政治历史常识，我们不难推断，他有着三种可能的因应选择：一、挺胸而出，对《五·一六通知》说不；二、主动辞职，避其锋芒；三、逆来顺受，侥幸涉险过关。从政治家政治作为和历史评价的角度，三种选择的排序依次为上策、中策和下策。

人们一定会认为，第一、第二种选择属天方夜谭，绝无可能。在毛泽东拥有巨大权威和声望的历史条件下，刘少奇没有那份胆量与其公开对抗，也没有那份勇气提出辞呈。不错，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由于长期以来以刘少奇自己为首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让毛成了党的化身，位尊全党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权威，任何对毛的抵触就意味着对党的抵触，是引发全党共愤的反党行为，刘或不敢也无力与毛直接对抗；而在毛泽东捅破最后一层窗纸之前，主动辞职无异于长城自毁。然而，如果我们从微观历史的角度，也就是从刘少奇作为政治行动者自主行动这一角度，考察历史，我们会获得不尽相同的看法。

一、选择挺胸而出，对《五·一六通知》说不，不是没有可能。以1949年之后的具体历史而言，虽然毛泽东威望日隆，权位至高，但并不意味着总是真理在握，一贯正确，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没有遇到任何的质疑与挑战。1959年彭德怀庐山会议上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的质疑姑且不论，就刘少奇，至少1962年与1964年两度“冒犯”过毛泽东，前者关乎农村经济政策调整，后者涉及四清运动重点指向，刘均大胆地向毛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再从现实政治操作的可行性看，刘少奇也有一充足的理由可以将《五·一六通知》束之高阁。我们知道，《五·一六通知》主要是批判否弃《二月提纲》的，而《二月提纲》却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中央常委集体讨论通过的，并报送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党无以撼动的组织原则。坚持组织原则，凭此一由，刘就有了可以说不的底气。何况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并不在场（不在京），没有与毛的面对面的难堪与直接冲突的压力，刘于行事更为有利。无论既往历史和现实情形都显示，历史存在着刘少奇可以说不的可能性。假如刘少奇做出了这一选择，历史很可能就是另外的模样，至少不会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疯狂。那么，为什么刘少奇没有做出这一选择，没有挺胸而出抵制这份危及自己政治生命的纲领性文件呢？

毛泽东的巨大存在和文革反修防修的“政治正确”，是影响刘少奇行为选择的两种显而易见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另有第三种因素，或许更深刻的因素，在阻止刘少奇做出抵制《五·一六通知》这一行动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员行为准则规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党的一项重要组织原则。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这一原则有过堪称经典的表述：“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刘少奇以“原则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强”而称誉党内，对党的原则从来就是“身体力行，说到做到”。（刘澜涛：《共产党人的典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这一原则已完全内化为刘少奇坚定不移的信念，成为指引与规范其政治行为的准则。

刘少奇心里当然清楚《二月提纲》并无原则问题，《五·一六通知》对它的批判不过借题发

挥，其真实目的乃是冲己而来，但《五·一六通知》提出的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及其代表人物，是包括刘在内的全党共识，是党的一项伟大事业。正是因此，面对着发起文革运动与个人挨整下台的矛盾，也就是在面对革命前途与个人命运冲突之时，刘少奇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行为准则的指引与规范，也就是受到它的限制与约束，未能勇敢地挺胸而出捍卫自己，却不由自主地服从了前者。只要将刘少奇此前的“冒犯”与此回的“不冒犯”做一比较，这一问题可以看得更清。62、64年所以两度敢于直言，那是因为关乎人民的命运和党的事业，刘少奇无私无畏，理直气壮；而是次遭遇的是个人的挨整下台，牵涉个人问题和利益，刘难免心虚气短，所以缄默不语，隐忍不发。然而，这一隐忍不发的行为结果，让刘少奇最终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深刻悖论：刘少奇由于遵循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行为准则，而未能做出正确（最佳）选择，从而导致后来的命运悲剧；而如果要避免悲剧命运，则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做出正确的选择，就意味着遵循良知，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得不承认，就是在今天，在坚持集体主义至上的社会，奉行这一准则仍是无以动摇的天经地义，但又不能不指出，历史以残酷的事实已告诫人们，如果人们不能遵循内心的良知，不能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站出来发声，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那么接下来的一定是悲剧的开始。

二、刘少奇未能挺胸而出，抵制《五·一六通知》，做出最佳选择，那么，退而求其次，选择辞职呢？辞职是政治家遭遇严重政治冲突或遇到重大挫折难以为继时用以化解危机摆脱困境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把它看成自毁长城是一种政治无知与偏见的表现。既然刘少奇知道毛泽东绝对来者不善，自己不能做抵触对抗，又清楚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主动引咎辞职，避其锋芒，未尝不是一种保全自己的策略选择。刘少奇以什么原由辞职呢？《二月提纲》是刘主持常委会批准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既把《二月提纲》视为严重原则问题，批得一无是处，不妨以此为由，引咎辞职。遗憾的是，刘少奇却是近三个月过后，在文革战火已燎原全国，毛泽东愤笔写出致刘于政治死地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常委会改组，其接班人被废，排名降至第八之时，提出的辞职（见《刘少奇年谱》），而此时已错过最佳时机。刘少奇未能在发觉毛泽东整肃自己的5月，在文革发动之时选择辞职，与其说缺乏勇气与智慧，毋宁是心存侥幸，怀抱幻想。

诚然，毛泽东既决意清除掉刘少奇，刘辞职不辞职，结局都一样，都会被揪出打倒。但效果大不相同，历史评价也有分别。试想，刘选择5月辞职，其情形很有可能如釜底抽薪，文革势焰势必大减。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冲刘少奇这只“大老虎”而来，刘主动辞职在很大意义上就变成了“死老虎”，面对“死老虎”，别说群众打起来没劲，毛也会自觉无趣，失去大半鼓动的理由。更为主要的，对刘少奇而言，因此可避免直接卷入文革运动，而不会出现后来使其令名蒙受玷污的负面行为，在历史评价上可以得到更多加分。

当然，从另一角度，正因毛泽东以刘辞职成为“死老虎”感觉无趣，失去鼓动群众的造反理由，而不会接受这一行为。为了达到政治的最大效果，显示文革扫荡牛鬼蛇神的强大威力，毛需要让刘保持一定的政治身份，接受群众的批斗而遭受煎熬。事实也正是如此。1967年1月13日，被公开打倒而受到群众批斗的刘少奇幻想破灭，彻底醒悟，再次向毛提出辞职，请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虽说刘没在5月辞职，陷入被动，是一失误，但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刘从自身的屈辱体验感受到了文革的厉害，意识到了自己及家人的危险处境，愿意以辞职来换取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保障，平息陷入混乱的社会动荡。这是政治失败者发出的最卑微请求，也是落水者没顶之前欲抓住的最后一个救生圈。假如这一请求被接受，假如毛泽东抛下这一救生圈，就绝不会出现后来谁也不愿看到和接受的刘受尽凌

辱而殒命开封的悲惨一幕。

前已指出，政治家辞职是化解政治冲突与危机的有效手段，也是政治失败者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表现。在讲究政治规则的现代民主国家，国家内部的政治冲突与危机，往往是通过负其责任的政治人物的辞职下台而得以化解，从而避免引起政治与社会的进一步动荡。但在文革中国，最高领袖却拒不接受刘少奇辞职。乍看起来这或许是毛泽东为了实现其政治效果的最大化，突显文革运动的现实意义，致政治对手于难堪而采用的一手阴招，但往更深一层看，它折射的却是，一个组织内部其成员个人自由权利的丧失殆尽与一无所有。中共以铁的组织纪律原则而著称。这一纪律原则规定，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所谓服从中央，归根结底，就是服从党的主席这一最高权力。所以，除了最高权力一人，关键时候，包括党的副主席在内的任何一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意志和自由。因此，别说辞职（求生）不能，就是自杀（求死）也要受到谴责。罗瑞卿不堪其辱选择自杀，被视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陈伯达重压之下准备自杀，需要援引马克思女婿拉法格自杀后依然受到列宁的纪念为例，来证明共产主义者自杀不为背叛。一个组织或社会，如果走到其成员连辞职的权利和自由都没有时，距离悲剧也就一步之遥了。

三、刘少奇为党员行为准则所规范，又心怀一定的幻想，如此，他能做的选择惟有第三种选择。其所以做逆来顺受的选择，自是希望通过最后的努力，以具体行动消弭毛泽东对自己的怀疑和误会，争取重新获得毛的信任，以化险为夷，涉险过关。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运动中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表现积极，有所作为，以此来证明自己坚定的革命性和对毛的紧跟服从。于是，在其受权领导文革运动初期的几十天里，刘少奇一方面主持对彭、罗、陆、杨等已倒台的党内高层进行揭发批判；另一方面派出工作组进驻北京大专院校，将众多文教领域的权威人士打成黑帮，把大批师生生活跃分子作为右派进行揪斗。但很不幸，尽管如此，刘少奇还是不免掉进毛泽东早已设计的“请君入瓮”的陷阱，未能摆脱被揪出打倒的厄运。更不幸者，这些用以证明自己的文革行为，到头来却成为遭人诟病的负面现象，令其英名蒙受玷污，让自己从受害者同时成了施害者。

这其中，最发人深省、也是最能显示刘少奇命运悲剧性因素的，是其对于党内彭真、罗瑞卿等被打倒的同志的批判性行为态度。彭、罗堪称刘左臂右膀的亲信僚属，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刘最为清楚和了解。他们的突遭整肃，受到不实指责与诬陷，刘事先并不与闻，但事中保持沉默，未置一词，事后主持批判，毫无含糊，让人困惑。尤让人不解的是，罗瑞卿跳楼自杀，刘少奇态度不屑，辞色严厉，谴责“他的这种行动，是對抗情绪，是严重地對抗党，對抗同志们的批评。”

诚然，以前者而言，人们可以认为刘保持沉默是高压之下的违心之作，主持批判是划线切割的自我保全，但他如此自断其臂、向毛输诚的同时，显然忘记了“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古训。这一古训的一个隐蔽含义，翻用当代话语，那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看他人蒙冤而保持缄默，明天他人就会见我们沉沦而陷入沉默。1968年10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诬指为“叛徒、内奸、工贼”，与会代表133人，除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一人外，“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党的最精英人物中已没有任何人为其说话，“竟无一人是男儿”。

就后者来说，人们也固可以认为罗的行为确含愤激的情绪，但即便如此，对不堪其辱而自杀这一行为的追加谴责无疑反映了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不幸者缺乏哀矜勿喜的同情和怜悯。没有同情与怜悯，实质就是人道主义的失落。人道主义是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人类诸多“主义”之本。它的存在与施行，可以让人们哀于逝者，痛于伤者，扶于弱者，悯于败者。惟其如此，人类社会才不至因权争利斗而过于残酷无情，也不因尔诈我虞而陷于绝望境

地。人道主义一旦丧失，人们为权争利斗必是残酷无情，不到你死我活，不肯罢休。刘少奇后来正是因此而遭遇非人待遇与折磨，以至于惨死开封。

刘少奇惨死开封，时间在1969年11月。然而，资料显示，1966年6月下旬，就在他谴责罗瑞卿自杀的同时，他自己就有了死的预感，并为此做了准备。据刘少奇之子刘源回忆，1966年6月底，刘少奇将儿女们召集一起，说出一番令其“吃惊”的话：“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允斌“受到震动，当场拿出200元钱，后来存到了小妹潇潇的存折上。”（黄铮：《王光美访谈录》页106）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更为之悲哀。毫无疑问，刘少奇这是想到了死，在交代后事，做死的准备。但他想到的肯定不是自杀（自杀是自绝于党，被打倒之后刘明确表示“我绝不会自杀”），他想到的一定是被整死，死于他人之手。这就意味着，刘少奇已洞悉一切，看穿了这场运动的黑幕与残酷，不然，他怎么会想到死，想到向家人交代后事？可是，他现在仍然是党内排名第二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在主持领导这一运动，他为什么宁死也不站出来，与毛泽东摊牌，叫停这一运动？

“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最后是要摧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很广泛的革命，不是一下可以做到的，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但是这是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的变化。”

这是刘少奇6月27日的一个会上讲话，与其对家庭的谈话发生在同一时间。两相比照，我们不难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与外部世界在经历一场疾风暴雨一样，刘少奇内心正处在一种剧烈冲突和极度分裂的状态，一方面坚持于肯定认为文革运动的革命性、正确性与必要性，因而对外保持高调；另一方面畏惧于毛泽东可怕的权力图谋及其黑幕与残酷，对个人前途悲观无望，而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由于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而党的领袖代表着党，是党的利益的集中表现，与毛摊牌，意味党的分裂，党的利益和形象就会受到损害。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利益，个人不得不忍辱负重，做出牺牲。这就是说，刘少奇想到“最坏的打算”，也不与毛泽东摊牌，乃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利益这一大局，所做的忍辱负重，自我牺牲。此与一个月前选择逆来顺受同出一理，别无二致，都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行为准则规范下的身不由己（当然也可以说是自觉自愿）。

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大局和形象，忍辱负重，宁愿牺牲自我，而走向祭坛，刘少奇作为杰出的共产党人，所表现出的殉道精神诚然令人肃然起敬。但历史却出人意料，刘少奇的忍辱负重，他的悲壮地走向祭坛，不仅没有如其所愿维护住党的利益和形象，党的利益和形象反而一落千丈。因为，刘少奇之死将党领导的文革运动毫无人道人性的残酷与残忍暴露无遗，党的形象因此大受损害，党的事业为此遭受严重挫折。（但，这已与刘少奇毫无关系，不是刘之过，此正如毛泽东发动文革整肃刘，使全国人民从文革中觉醒，不是毛的功一样。）

刘少奇断不会想到自己忍辱负重的行为会是这样的结果。不，刘少奇应该想到了这点。只不过他是从另一个角度，从他作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终生献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革命家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受尽迫害与折磨的角度。在被打倒到死去的近三年的时间里，他应该对此有过痛苦的反思。反思的结果，只是因为太过残酷，他不愿意承认，也不愿说出。正如彭真，历经文革劫波之后，被问及文革时说道：“文化革命很

复杂，我心中有数不好讲。”不好讲就是怕讲，怕什么呢？怕影响党的形象，影响最高领袖的形象。这仍然不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之党员行为准则的规范。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966年5月当刘少奇察觉毛泽东发动文革整肃自己的图谋时，他面临着上、中、下三种因应对策选择，由于毛泽东的巨大存在和文革的“政治正确”，更由于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党员行为准则的严格规范，使得刘少奇未能作出挺胸而出捍卫自己、抵制《五·一六通知》的最佳选择；而对毛泽东的心怀幻想，又使其错失了在最佳时机提出辞职的第二选择；于是，刘少奇做出了三种选择中最不好的选择，这一选择不仅让他的英名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直接导致了他的命运悲剧。其悲剧因与民族国家密不可分，所以巨大；而悲剧显示由“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行为规范，党员自由权利的丧失殆尽与一无所有，和毫无怜悯与同情之心的人道主义的失落”这三大因素所构成，因而深刻。

2013-6-12

□ 原载：共识网2013-06-17

~~~~~

### 【当事者说】

李雪峰专访：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

• 采访整理：李海文 •

#### 1、华北会议

1966年上半年主席一直在外地，由少奇主持中央工作。4月杭州会议之后，彭真同志受到批判，市委已很难领导工作。5月7日，中央通知我代理北京市第一书记，8日我出席了市委全会，并讲了话。但是这些都未公布。

我担任北京市第一书记，同时还负责华北局的工作。为了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五一六通知》，决定召开华北会议。按地区分组，华北局书记分别参加。北京市在北京饭店召开，内蒙、山西、河北在前门饭店，天津也在前门饭店。北京饭店仅是华北会议的一部分。参加人为书记、常委（彭真、刘仁除外），各区、县、局负责人，四清工作团负责人。大会从5月9日准备，5月20日报到，23日召开，一直开到7月20日。北京市批判彭真、刘仁同志。

但是我的想法还是老观念，虽然采取了组织措施，但认为还是在党内，6月23日在市委机关干部会议上，我讲话时再三的动员他们“引火烧身”，给他们出主意，说“你站出来检查工作组给你帮忙”，“可以晚几天回去”，“有的可以易地革命”。6月底，参加北京饭店会议的各单位负责人回到各个单位，市委各部委继续开会，参加华北工作会议。

#### 2、5月25日康生、陈伯达设圈套骗我到北大讲话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彭佩云是大学部的干部，市委要提她为副部长，华北局没有同意，市委任命她为北大党委副书记。陆平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后来才知道这是从康生线的人早就到

北大活动的，他们早就派曹轶欧等人在北京大学串联。

大字报一出来就将党内矛盾公开了，而且这是1957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一下子就引起轰动。学校内部，学生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两派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在辩论中青年人气火大，有个别人动手，发生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消息马上传到国外。北大的校门历来是敞开的，外面的人闻讯后纷纷进去看大字报。

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要我去北大，说：“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连，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看来他们放了火，还不知毛主席的态度，怕火烧到自己，急于稳住阵地。

我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这时吴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

陈讲：“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作工作，不要上街。”我想，非中央讲话不可，我也不能给主席打电话，现在夜半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联系，因而没有答应。又拖了一下。

陈伯达着急了，第三次给我打电话，话讲到这种程度：“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我还是不答应，他又说：“我们一块去。”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已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负责运动的。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

5月16日之后，为组建中央文革小组，原规定一个大区出一个人做副组长。我知道东北局派的是郑季翘，因而我们就和康生讲，推荐华北局书记池必卿参加。池到华北局是总理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点的名。他是山西省委书记，分工管工业。他原是山西省工业部长，曾到大同办工厂，山西省委要他，他又回到省里。“文革”后他到天津当第二书记，后到贵州当第一书记。康说不行，说他在阳泉和池谈过话，对他印象很坏。后来池告诉我：康生完全放屁！他从来没有和康生在阳泉见过面。我又提议华北局候补书记兼宣传部长黄志刚，他在山西当过省委宣传部长，康又说不行。1966年春天中央理论小组派了曹轶欧等人到北京、北大，华北局也派黄志刚带了工作组到北京、到师大，两人对搞运动的主张不一样。康生不满意黄与这件事有关。康又说不行。我说：你看谁合适，他说：没有。我心里想：难道华北局能拿出来的人就一个没有了？你这是干啥嘛！

两天后，5月28日中央公布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华北、西北、东北、西南四个大区的人员以后再定。

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打电话来，我同他并不熟。他说：我刚从康老那里回来。康老要你和蒋南翔一起去。他原准备是和我们三个人一起谈。我去后，康老说：“既然你来了，就先和你谈，请你转告雪峰同志。”张彦转达康生的话同陈伯达讲的差不多：北大发生的事很紧急，要马上处理。明天大字报要上街，学生上街，别的学校要上北大支援，要我们去说服，刹车。张说总理知道此事，总理的意思要做工作。（“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来势很猛。实际上，总理、叶剑英已成立了首都保卫小组，具体准备了什么我不清楚。但当时已派了巡逻队将北大封锁。）

张彦还具体转达康生的意见：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我根据张讲的精神想了几条。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康生在八大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增

补为书记处书记。在书记处内分工，他帮助小平同志管全面。我是1956年八大担任书记处书记。那时书记处只有七个人：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和我。62年9月增选了陆定一、康生、罗瑞卿，撤销了黄克诚和谭政。主席讲过对大城市的管理是两条路线，中央管，书记处也管，谁管的对就听谁的。实际上我对农村四清工作抓得多，对城市工作很少过问。康生在党内资格老，地位高，大家都称他为康老。

过了一会，康生来电话。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他说：蒋南翔已经来过了，你不来也可以。我说：陈伯达来过电话，要我讲话。康生听了没有多的话，表示可以。我想是不是向少奇汇报一下，一看快12点了，我还没有习惯，有事非找领导不可。既然张彦讲总理有话，现在康生、陈伯达也讲了，还是应该去。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我抓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的干部，让池必卿做聂的工作，和外面的人通信。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已是12点多了。我和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这暴露了康、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也在。他们在礼堂召开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而且已经开过了。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

陪我上主席台是刘仰峤和张彦。又要开会我讲什么？我就叫张彦再提供一些情况，传达周、康、陈的指示。我一边听一边想，心里生气，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请张彦先讲讲，我主持会。他不讲，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了。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25分钟。我说：

我们惊动你们，但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是最好的形式，是武器，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中央和国务院现在考虑、指示，不要把内部和外部的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要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修正主义影响是长期的事情。文化领域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是要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要5年到10年时间。主席说：我这一辈子不行了，你们再接着来。我们要进行一场尖锐复杂但也是很细致的阶级斗争，这要有坚强的领导。最高司令就是毛主席，就是党中央。因为这场革命涉及面广，所以要一步一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的打。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别的还没有准备好。这场斗争涉及到若干方面，报上有点名的，还有没点名、没有拿出来的。究竟要发多少炮弹，下一步如何发展将来就会知道了。北京的群众都动起来了，北大也动起来了。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必须领导好，指挥好。北大党委要把这场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这不是束缚大家的手脚。报上登出来了嘛，还束缚什么？那些地方搞得不好可以提出批评，可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报告给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都可以。

这场斗争动的是笔杆子，是思想文化斗争。现在解放军还用不上。要在这方面组织领导。最近北京中学生热情很高，到《北京日报》社提抗议，这是好事，但太多了也不好，不要太多了。有人开大会声讨，外地还发通电：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这是好事。但是给外国人看，好象党中央摇摇欲坠。开大会声讨这个形式不是最好的形式。我们要动员群众，通过座谈会，分析批判，写大字报小字报等形式，大会声讨也要组织好，不要出洋相，能说不开就不开，要开就开，但开会声讨不是最好的形式。敌人（帝、修、反）会抓我们的小辫子。我们不怕，我



们辫子粗，抓也抓不住，但最好小辫子也不让他们抓。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员有民主权力，不过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外部的，外国人可以看，内部的，外国人不可以看。党内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如果讲不通可以贴。有些人说通了可以撕下来，有些人不撕可以贴上新的盖起来。总而言之，千言万语，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但是你们要有领导的行动。

后来群众概括为四条、五条：1、不提倡写大字报；2、大字报要内外有别；3、要有领导；4、有步骤；5、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

我讲完了，张彦又要讲。他讲了20分钟，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但他口气不硬，和我讲的一样。

会后，我回到家里，睡不着，心里考虑，中央还未吭气，我这样作合适不合适？天还没大亮，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不想碰了个钉子。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一个话，他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我赶快就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少奇说：“那也不要。”说完了，他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这句话把我解脱了。

通过这一天的事，康、陈来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 3、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社长的职务，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并由他领导。

改组后的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5·18讲话精神公布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律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然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此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席卷神州大地。这是毛主席点的第二把火。

### 4、毛主席在杭州决定发表第一张大字报

6月1日，我们正在开华北会议，由我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的很匆忙，我已记不清了。因为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6月1日晚8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

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毛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我从前对城市工作管得少，对北京中学更不清楚，两眼一摸黑。我让市委的同志在北京市地图上标出了300多个中学的校址，情况紧急的地方还插上旗帜，如同作战一样紧张。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的文章宣布“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拾。

## 5、中央决定成立新市委

聂元梓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旧市委，这样新市委必须赶快组建并公布。5月26日开北京市委全会扩大会，我宣布中央改组市委书记处的名单，李第一书记，吴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杨文、马力为书记。28日起草市委书记处改组电报，报中央。29、30日中央召开会议，研究了《5·25大字报》贴出来后的形势，中央决定以中央名义在《人民日报》公布新市委的名单，同时以中共中央名义任命张承先（原河北省委书记）为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周恩来提了一个意见：关于彭真、雪峰的职务由中央的名义宣布，张承先工作组长的职务则由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公布为好。6月3日在大、中学会议上，4日在工交、市委机关会议上，我到会并宣布了中央改组市委的决定。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领导。”书记处书记有：高扬文、郭影秋、马力、万里、陈克寒、赵凡。后三位同志均是原来市委书记处书记。

中央讨论北京市委改组时，我们提议除了彭、刘外都保留。彭的处理是主席在杭州会议定下来的，我们不能讲什么。我们在常委会上汇报了北京市委书记们的来历。万里是太行的干部，由城市建设部部长调到北京任书记兼副市长，他是1958年来的，担任副市长的时间不长。他到北京后，彭真说万里和郑天翔哪个摆在前面，工作一段再看。万管市政，郑管工业。我介绍北京市工业主要是郑天翔抓的，讲了一些好话。他是晋察冀的干部，彭的老部下。介绍赵凡不是书记，是常委，意思是他在书记处核心之外。陈克寒是太行的干部，《新华日报》华北分馆馆长兼总编辑，和我一起南下到武汉，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从文化部调到北京市。这样我们保了万里、陈克寒、赵凡。

7月29日要开万人大会，我们确定万里指挥，因为过去北京市“十一”检阅、开会，他的经验多。群众反对，还比较激烈。后来我们决定仍由万里指挥，可是不出面。但是大家还不同意。我们没有理他们，最后还是万里指挥的。他下台比我还晚，是1966年12月。

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消中共北

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务。”

新市委一公布，群众是拥护的，敲锣打鼓庆祝、欢迎。新市委开会我都没有去，差不多每天晚上到中央汇报。6月1日大字报一公布，《人民日报》社论一发表，我们也保不住了。

## 5. 中央制定八条，贯彻八条

6月3日上午11时，中央在少奇同志家召开会。少奇主持会，小平讲话，总理在，参加的有：陈毅（外交口）、薄一波（工交口）、李先念（财贸口）、陶鲁笏（农村口）、叶剑英、陈伯达、康生、汪东兴、陶铸，我和郭秋影代表北京市参加。大家在会上说，现在搞运动总得有个办法，大家议论了七条，我建议再加一条群众路线。小平首先表示：好，同意。

讨论完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大。因为我要传达，中央又没有指示，我就从头到尾将八条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陈毅讲了一段话，他表示很高兴，对我说：你再说一遍。他拿出了小本子记。当时他也很紧张，外办、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

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引导，坚守岗位。

1970年在庐山，陈毅参加华北组。在正式开会之前，江青先讲了陈几句好话，然后把陈老总训了一通。大家心里不满，江青你算什么？！陈毅那么刚烈。开小组会时，陈毅和我坐在一起，又议论起这八条，他说：“在那个会上讲的最多的除你之外就是我了。”我们又说到岁数。我说：“你快65岁。”他说：“你可小看了，70多岁了。”当时他的情绪是非常憋气又无奈，大家互相之间很同情，我们南下时曾在一起工作过，但是互相不敢讲私话，又想找人讲几句。

制定出八条之后，我说：“有了这八条就好办了，现在需要向下讲。”

小平说：“开个十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

我说：“还得准备，先分开讲。今天晚上开第一次会，包括机关干部，第二次包括学校，分开讲，工作几天再看看情况。”

他说：“好。”

6月3日、4日，我们连续召开了大专院校，工交、财贸系统工作组和市委机关干部的会议。在会上我讲了政策界限，宣讲了“八条”。同时市委请示中央后决定中学集训、军训。这样中学的形势慢慢控制住了。后来这些都成了“错误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限制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这个八条，还有我在5月25日的讲话，这两个东西实际思想是一个：现在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要坚持党的领导。虽然在讲话中也讲到放手发动群众，但是要纳入我们的轨道。

6月1日到10日是宣传阶段，发动群众，就是让群众骂你，我们在那第一炮打官僚主义，炮打司令部，朝我来，谁也没有想到“文革”来的那么猛。6月1日晚上8点，第一张大字报在广播电台一公布，群众马上起来了。一些群众要求斗争单位的当权派，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这些同志都住在北京饭店开会，没有回去接受批斗。

那时，每天工作都忙得很。每天晚上吃饭都是两桌人，孩子们还要等到第二轮才能吃。临时加一桌饭，厨师老吴马上做，从未怨言。晚上之前，华北局书记处的同志有解学恭、池必卿等人

到我家来开会，汇报材料，汇报不完，边吃边讲。

吃完饭马上到中央去开会，中央由刘少奇主持。几乎每天晚上开会了解北京市的情况。情况越来越混乱、紧张，政变的谣言越来越多。

总理那里成立首都工作组的会议，总理亲自抓，叶帅参加，我也算一个成员，但是没有时间，就派华北局书记兼秘书长苏谦益参加。首都工作组主要负责首都的保卫，做了很多部署，中南海的驻地都做了检查，以防万一。小平对我说：杨尚昆是单干户，他是另外的事。但是什么事，我也不清楚。7月主席回到北京，一撤工作组，这个委员会也没有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已无法开会了，名存实亡。

6月7日华北召开工作会议（也称前门饭店会议，各省除北京在北京饭店外其他各省的会址在这个饭店），会上各省都闹起来了。内蒙古分东西部，原来就有矛盾，这一下子又起来了，批判乌兰夫同志。河北批判林铁同志。并在组织上撤了他俩的职。山西省委、天津批袁振、胡昭衡，华北各省搞得焦头烂额。

## 6、第三次（6月）杭州会议

这是1966年在杭州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时间是6月10日。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发表，全国形势紧张，牵扯派工作组的问题。我估计少奇、小平会向主席反映意见，要求再请示一下。6月8日邓小平电话，通知中央到杭州开会。

9日我从北京飞上海，由沪抵杭州。6月10日下午7时半，我们到主席住地——刘庄开会。少奇、小平、总理、陶铸等中央负责同志及各大区的书记都到了。

10日开会，主席主持。主席没有主动讲，也没有什么题目。主席略微问了一下，也没有一个一个地问。问了一下群众怎么样，你们动作了些什么。各大区书记汇报。西北局刘澜涛汇报，主席不太感兴趣。我有个汇报，主席也不太感兴趣。我在会上讲得也很简单，因为主席没有提问，我也没有多讲。各大区也没有多说的，运动已发动了，这些人都还没有受到冲击，思路还是过去常规的，考虑如何领导。我们一贯思路是：党的领导是必要的。少奇讲放手发动群众，谁放手？抗战时期主席讲统一战线，敢不敢放手实质是带路线性的问题。现在放手不是撒手，放手放到谁的手上，各大学的党组织都没有了，如何领导？也许除了柯庆施在上海可能知道一点底细，（可是他又去世了）我靠着中央不知底，其他各大区的负责人更摸不清了。

主席问：怎么样？各地的汇报都一样，就是讲工作组的问题。这次会议实质问题是请示是否派工作组。这时主席比较和缓，只是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也没有严厉的语言。他发脾气，你就注意检查自己，他和气地点一下，是要你自己注意。他说：“大乱一下再说。我们规定一下政策，现在还产生不出来，还看不清楚吧。”他没有太明确的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原来我们认为是陈伯达要求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陈肯定是要向主席通报或请示过的。即第一个工作组是中央文革、中央派的，是毛主席批准的，陈伯达为首。

这次会不象前二次杭州会议：主席没有系统讲，讲几句又停了，汇报到工作组，讲几句工作组，汇报到外交，讲几句外交。总之，主席讲的含糊，大家搞不清主席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同意派工作组，只是考虑不要急忙派。会议期间，吴德、解学恭分别从电话向我汇报北京和华北地区文革情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情况，写电话稿，小平同志看后，批报主席，主席划了圈退我。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派工作组成为路线问题。我始终搞不清为什么成为路线问题，是群众领导我们，还是我们领导群众？我们两手空空，谁也抓不住。

会议不长，也就一个多小时，主席和少奇他们是否有过讨论就不知道了。印象不深。10日、12日主席主持了两次会议，11日是少奇主持，江青汇报。13日我离开杭州，到上海，当天飞回北京。后来听说毛主席从杭州去了长沙，直到7月18日才回到北京。

从杭州回来后，工作组还在派。主席是没有下决心，还是有意考验干部是否跟他，中央既要放手，又要有政策，毛的答复不明确。中央还是八条方针，只是更加放手。总之，主席没有交底，远不是他过去讲的，“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告诉群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过去的传统全变了。我们从杭州回来后，不仅继续派工作组，而且派的更甚了。向中央、军委、国务院各部委、向兄弟省市求援，先后派了一万人。我带华北局的干部，安子文从中组部抽了80多人，从全国各地抽了不少人，从团中央抽干部由胡克实负责到各个中学，总政刘志坚派了不少军队干部参加工作组。

6月中下旬，出现赶工作组的现象，北京50几所大专院校中，有30几所赶工作组。但是在京的中央同志少奇、小平等都认为离了工作组不行，希望工作组改正错误，领导运动。我也是这个想法，也是这样做的。向群众提出既要批评工作组，又拥护工作组。华北会议，前门饭店开到7月16日结束，北京饭店开到7月20日结束。我还是老观念，老传统对待党内斗争，散会时我对大家说：“希望参加会议的人能站出来领导。”

华北局工作会结束，“旧市委”的同志往哪里放？因为在北京已不是只限于学生搞运动了，各单位都在斗当权派。因为北京市已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已改组，下面的各个单位当然都是执行了市委的指示，因而当权派都被怀疑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特别是原来能干的、受到市委重用的干部，这时都成为运动的重点。如果原来班子再有矛盾，有的领导干部在后面支持，群众很快就起来了。各单位都在揪斗当权派，有的单位群众不讲政策，向大学学习游街、戴高帽子。运动起来后北京市死了好几个干部。“八一八”之后来北京串连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不但要到大学参观学习而且也要斗黑帮，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对这些干部应保护起来。

形势发展的非常快，一开始说学中央对杨尚昆的办法，送到外地。外地到哪为好？1964年我去过五台山，山高路险，只有一条土公路，一般人去不了。把他们放到五台山，背靠背揭发，保护起来。但形势紧急，要斗人，群众要人，不能放的太远，以免被动，就将他们放到南口。8月24日集中，这天是红卫兵走上社会破四旧的高潮，当时叫红色恐怖。为了保密，事先不能告诉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造反派给那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反修堡，说我们包庇黑帮，将他们供养起来了。其实是半日学习，半日劳动。是司机将消息透出去的。到了9月，我已经停职，市委也顶不住了，只好将他们从南口接回来，回到各自单位，也就是回到群众中去，回到群众中去就是挨批、挨斗。

□ 原载《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

~~~~~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六）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0 7 a 第六章 在高压下抗争的“414串联会”（1967.4—1967.5）〕

## 第七节 谈判异常激烈，只为加不加“正确”两个字

本来第三条还有“调整和扩大总部”的内容，但是谈判中对此没有涉及。即使总部调整扩大，再增添几名4 1 4人士，加上我和王良生原有的委员，总部里“4 1 4串联会”的代表依然只是少数。

我们担心的是，团派占绝对优势的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极有可能作出非常不利于4 1 4的决议，譬如，以大局为由要求解散“4 1 4串联会”。对这样的决议，要是不执行，就是违背《四项协议》。要是执行，无疑是自己钻到自己结的套索里去，吃哑巴亏。无论哪种情况，都会非常的被动。

对于第四条，我们一开始主张干脆不写，回避处理。团派坚决不同意。谢富治也支持团派的意见。我们一看反对不了，就强烈要求在第四条中加上“正确”两字，修改成““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正确决议必须执行”。

团派代表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为了维护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的权威性，它作出的决议当然必须无条件执行。他们内心是想以这一条来束缚4 1 4，担心要是加上了“正确”两字，4 1 4就可以利用这两个字把一切不合4 1 4胃口的决议都说成是不正确的决议而拒不执行。

这一条款，就像是如来佛的“紧箍咒”。没有这一条，团派担心4 1 4这个“孙猴子”随时会造总部的反；有了这一条，4 1 4担心总部随时会想出什么妖蛾子整治得4 1 4头痛欲裂。

两边内心的担忧都有一定道理，彼此也心知肚明，但又都不便拿到台面上来。于是为了加不加“正确”两个字，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吵得不可开交。6 8

一年前，要是工作组说“工作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蒯大富会认为这样的说法符合毛泽东思想吗？我坚信蒯大富肯定不会同意这样说法的。““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这样的说法违背毛泽东思想，实在太明显了，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能一眼识别的。而现在，因为这有利于蒯大富了，他就坚持这样的说法。看来，还是利益决定观点，屁股决定脑袋。

我们深信加上“正确”两字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所以顽强争取。我们当即背诵了一段很熟悉的毛主席语录：“对于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我们还说：“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连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上都要加“正确”这一限定词，对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反而不允许加“正确”这一限定词，岂非咄咄怪事？

谢富治迅即掏出语录本，以我非常惊讶的熟练程度翻到第1 0 3页，带着大舌头腔念到：“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我们反驳：““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都不是党的机关。”

谢富治疾言厉声地回驳我们：““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权力机关，也适用的！”

我们顶嘴说：“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经常做出错误的决议。”我们索性打开窗户说亮话，把心里的顾忌摊上了桌面：“如果回去以后，他们利用多数做决议叫4

1 4 解散，我们难道也要执行吗？”

谢富治拉长了脸不悦地说：“你们应该相信他们，要互相信任。”

一句来一句去，我们顶撞着谢富治，据理力争，毫不示弱，但是气氛越来越僵硬。

形势严峻，连一向稳重少语的龙连坤顾不上干部的身段，忙不迭地帮腔。我也赶快放下“首席谈判代表”的架子，一再插话抢话。其他几位学生代表尤其是沈如槐急得有点脸红脖子粗，嗓门也高了起来，极力反驳谢富治的谬论。

团派代表在旁边使劲起哄，说 4 1 4 对大联合没有一丝诚意，4 1 4 公然反对谢副总理的指示……

我们不顾脸面的顶撞抢白，团派代表的火上浇油，彻底把谢富治惹毛了。他虎着脸说：“我是为促进你们的大联合而来的。你们这样吵来吵去，连我这个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也管不了你们啦！你们不把我放在眼里，谁要当就谁来当吧！你们要是想打内战就去打吧。一年二年都没关系。等你们打够了，再签协议！”

谢富治撂下的狠话，就像是下了最后通牒。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被逼到了死角。

我一看谢富治沉下脸，动了怒，心里又是担心又有恨意。过去对他的敬重，在此时已经消失殆尽。眼前的谢富治如凶神恶煞一般，已不是军人的威严，而是蛮不讲理的霸道。

我看到蒯大富、鲍长康的嘴角上挂着得意的微笑。微笑里面，还有一丝对我们的冷笑、嘲笑和幸灾乐祸。

明明白白这一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还非得在这样的协议上签字。在谢富治虎视眈眈的威逼之下，一股被逼订立城下之盟的屈辱涌上心头。

就我心中的怒火和愤懑，我真的很想猛拍一下桌子，腾的一下站起来，吼一声：“老子不干了！”然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尽管我一介文弱书生，但是在逼急了的时候，偶尔也会有怒发冲冠的激愤冲动。

我当然可以不签字，可以把谢富治和团派撇在这里扬长而去，可以显示我们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但是，这样做的后果会很严重！团派回校以后，“拒绝大联合”、“破坏和平谈判”、“反对谢副总理”等等吓人罪名都会铺天盖地的压在我们头上。谢富治会向毛泽东汇报，很可能会惹得龙颜大怒。4 1 4 将陷入极大的被动，严重的后果谁也无法预料、难以估量。

我要是签字，明知这是明显违背毛泽东思想而又会给 4 1 4 带来极大危害，我如何向 4 1 4 的其他头头和广大群众解释交待？

实在是左右为难！

蒯大富已经代表总部在协议上签了字。

谢富治看着我。团派代表看着我。4 1 4 的几个代表也看着我，他们的眼神中，有愤怒，有屈辱，有无奈，有不安……

沈如槐凑近我的耳朵嘀咕道：“我们不签字！”我轻声地问他：“要是我们不签字，能走得了吗？”沈无语。

我想，四条协议，前面三条都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经过力争才得到的。尤其是9：4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最后一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为这一条而推翻全部协议不签字，可怕的后果立马就会降临到4 1 4头上。签了字，争得了基本的利益，可能产生的后果回去以后再慢慢想办法。

我心中权衡再三，没有其他办法，只得抓起重如千斤的钢笔，代表4 1 4签下了我的名字。那感觉，就像杨白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签字画押，内心有撕裂般的痛楚。真窝囊！真屈辱！真不甘心！

签字完毕，谢富治那张紫红色的嘴脸回嗔作喜。团派代表喜逐颜开，眉飞色舞，使劲地吹捧谢富治。我们一脸苦相，闷闷不乐。

这次谈判，沈如槐给谢富治留下了深刻的但是负面的印象。在我们临走时与谢富治握手作别，谢富治握着沈如槐的手，不忘批评了一句：“你这个小伙子呀，只能做一个闯将，不能做元帅！”

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们少言寡语，气氛沉闷，心情沉重。怎么向4 1 4群众解释我们怎么会在这样的协议上签字？怎么让4 1 4的其他勤务员理解我们这些代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心中茫然。

#### 第八节 墨迹未干，我就撕毁了《四项协议》

回校以后各自散去。我向4 1 4群众接待室走去。

不少老四已经得知我们受中央首长接见的消息，大家都很关心，所以一路上有人拦着我，关切地打听情况。我边走边说，到接待室的时候，后边已经跟着一些人。接待室里的人更多。显然，他们早就在这里等着头头了。

我简略地讲了谢富治主持两派谈判的情况，讲了《四项协议》的大致内容。

听了前二条，很平静，没啥反应。听了第三条，有点七嘴八舌的小声议论。一听完第四条，顿时大哗。责问声随即响起：“这么明显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条款，你们怎么不坚决抵制？”“你们为什么不先回来与我们4 1 4群众商量就签了字？”

开始，我还做点辩解。后来责问声越来越响，甚至还有责骂声。有的老四十分激动地谴责我们，说：“你们这是屈服于谢富治的政治压力，与团派搞妥协，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出卖了4 1 4战士！”

我自知理亏，本来就有点“无脸见江东父老”的惭愧，只是没想到4 1 4群众的反响会这样大。看这架势，《四项协议》在4 1 4群众中肯定通不过。

我对大家说：“当时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不得不签字的。你们要是不同意，就贴大字报道我们头头的反嘛！”



晚饭后，我到414广播台去。果然，那里已经有好些老四以及没有参加谈判的勤务员。见到我，又是一片责备声。沈如槐召集勤务站的人开会，说：“别互相埋怨了，要想想办法，到底该怎么办？”

多数勤务员认为前三条还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第四条。有人说：“勤务站应该发表公开声明，阐明我们的立场。现在先讲清楚，比以后蒯大富作了解散414的决议后不再执行而违背协议要主动些。”有人说：“参加谈判的头头就不要公开反对《四项协议》了，免得团派说他们是出尔反尔，撕毁协议。”大家都很同意。于是，我们想出了这么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主意：让没有参加谈判的“汲鹏等19个委员发表声明：(1)感谢谢副总理对清华的关怀；(2)抵制孙怒涛等人的右倾；(3)协议的第四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予承认。”

这样的一个表态，给人的印象似乎不是对《四项协议》的基本接受（前三条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是对整个《四项协议》的抵制和否定。

勤务组还默许甚至怂恿下面的战斗组造我们这些犯了右倾错误的头头的反。我们认为，414群众不满的情绪表达得越激烈，我们撕毁《四项协议》就显得越是有理，越是迫不得已。

对《四项协议》不满，当然也是对谈判《四项协议》代表的不满。我作为签字的首席代表，更遭到大家的严厉质问和指责。我本来已经十分愧疚了，这时连连认错。“亲自在《四项协议》上签字的孙怒涛翻脸否认《四项协议》，并作检查，承认‘丧失原则’，表示对对不起广大414战士，要求414战士炮轰414头头。”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414群情一片激愤，“东方红战团”、“三七战团”以及“近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声称协议‘根本违反毛泽东思想’”。绝大多数的表态仅仅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进行抵制，“东方红战团”中的一些勤务组成员不满意汲鹏等人发表的声明调子太软。他们单独发表声明，说“《四项协议》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对这样的上纲上线也很反感，认为过分。

团派看到414这样对待《四项协议》，大骂414背信弃义，也大骂我不讲信用，撕毁协议。

我陷入了团四两派共同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团派眼里，我成了那个在国共重庆谈判中墨迹未干即刻撕毁和谈协议的蒋介石。在414眼里，我成了那个屈服于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因而右倾投降的陈独秀。没一个人能理解我，原谅我，包括我自己也觉得无法宽恕自己。

414方面强烈抵制《四项协议》，团派方面也没有很好地执行《四项协议》。签字回来后的当天晚上，团派在大礼堂召开大会，蒯大富利用传达谢富治指示的机会，对414进行攻击。这明显违背了《四项协议》第一条“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的承诺。414抓住这一点，认为是团派违背《四项协议》在先，为自己抵制《四项协议》找充分“理由”。

414的反叛举动，团派的不检点行为，都没有逃过谢富治的眼睛。5月23日凌晨一点，414广播台的大喇叭叫我赶快去接一个重要电话。我一听是谢富治办公室打来的，非常重视，立即叫广播台同步进行电话录音。来电说这是谢副总理的指示，是传达给蒯大富和孙怒涛的：“你们总部和414协商所达成的《四项协议》，我已经报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应当坚决执行，这样作对你们有好处。”

我接听电话指示以后，对录音进行整理，并立即与沈如槐等人商量。我们对“这样作对你们有好处”的告诫不很理解。但是既然现在连毛主席都知道了《四项协议》，这就非同小可了。凌晨二点多，我通过414广播台一字不差地传达了谢富治的指示。当天上午在大礼堂由兵团总部召开的全校“庆祝毛主席对清华运动的巨大关怀”大会上，我再次进行了传达，并“代表414总勤务站表态，坚决拥护《四项协议》，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我对谢富治的指示是不折不扣如实传达了，但是对《四项协议》“坚决拥护、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的表态，完全是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仅仅是为了应付。

“414串联会”勤务站的所作所为也一点不漂亮。在统一运作下搞了一次阳奉阴违，施的是雕虫小技，演的是一出周瑜打黄盖的把戏，用以掩盖见不得人的背信弃义。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漂亮外衣下，最本质的是414的利益容不得有半点损失。

我现在这样严厉的抨击，对于那些留校的没参加谈判的勤务员显然是不公正的。他们只不过是出于保护414利益的派性考虑当了一次“周瑜”。即便是参与谈判的那几位勤务员，这样的抨击也是过重的。因为最后拍板签字的不是他们，而是我。

我在谢富治面前，既没有本事说服他，也没有胆量跟他翻脸。回来以后，一边忙着做检讨，一边与大家商量合谋。真正阳奉阴违、背信弃义的，就我一个人，无论我有多少无奈和压力，都不能成为这样做的借口。这是一次违背我以往做人原则的政治道德的堕落，我深感惭愧。

俗话说，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在这种氛围的政治斗争中，我学到的究竟是聪明，还是狡黠？我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地演变。

## 第九节 团派紧锣密鼓筹备革委会，414策划密室一心奔独立

团派的形势一片大好！

成立革委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得到了谢富治的坚决支持。《四项协议》已经签订，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团派上下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同仇敌忾，全力以赴，奔着同一个目标。可以这么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兵团总部这一边。而414正好相反，外有团派及谢富治的挤压，内有群众的普遍不满，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困境。

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得意容易忘形失态。蒯大富踌躇满志地说：“当前的大好形势，不光是‘百万雄师过大江’，而是要‘占领南京’了！”

蒯大富传达了5月23日谢富治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的四条告诉你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三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大富下台，414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都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几步，联合起来。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于是，团派就从谢富治的传达中拼凑出“414上台，不行！”的“最高指示”。这让我十分反感。毛泽东的话意确实是这个意思，但怎么能随心所欲地剪辑、演绎成这样的“最高指示”了呢！而且，对于谢富治向毛泽东的汇报，我相信《四项协议》的大致内容是会汇报的，但是不可能向毛泽东汇报414强烈要求第四条加“正确”二字、团派坚决不同意加这样的分歧细节。毛泽东也不可能过问得很细。能够听取清华两派的协议并且表了态，这对毛泽东而言已经是非常

难得的了。我对谢富治用毛泽东赞同《四项协议》这样的话来压414屈服，同样很不满。

“革筹小组”开会，两派各自推荐共提出“学生代表37名，革命干部5名，革命教职工7名，共49名；常委17名，主任1名，副主任4名”供群众讨论。

对414推荐的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团派搞起了连不少老团都感觉不太光彩的搞臭风。“团派按老蒯‘先搞臭、再进来’的指示，大字报铺天盖地造谣、污蔑、诽谤、歪曲事实，甚至公开谩骂无所不用其极。企图把414的革命小将、革命干部彻底搞臭。在团派“9.24”战斗组的一张大字报上，竟有24个‘让孙怒涛滚下来’的字样。总部委员鲍长康等人还大叫‘好得很！’”

对我的搞臭内容，也就是“九评”学习那点事情。

本书初稿曾向鲍长康征求意见。在一次聚会中，他对我说：“老孙，你知道对你的搞臭风是怎么组织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就告诉你这个几十年前的秘密吧。

那时团派已经掌握了全部学生档案。从我的档案中找到了我写的“九评”学习检查材料（我真不知道像我“九评”学习时候的检查材料都要装到我的档案袋里，今日听了仍令我感到极感震惊！）老鲍说，他把这些材料散发给一些战斗组，让他们写搞臭我的发言稿和大字报。我对老鲍说，我“九评”学习中暴露的问题在工作组时期已经有班上的同学在大字报上捅出去了。老鲍开玩笑地说，那是个人行为，我们那一次可是“组织行为”啊！老鲍又说，“你的书名叫《良知的拷问》，我也算是拷问了一次自己的良知。”我紧握老鲍的手，为老鲍坦诚、磊落的胸襟深深感动！

尽管那时我的脸皮已经练得有点“刀枪不入”，对我搞臭也无所谓了，但是我对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本身还是很反感的。为此，我、汲鹏、王良生发表了《严正声明》：“再次严重警告总部某些人，必须刹住‘搞臭风’，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过了两天，5月28日，在大礼堂进行革委会选举。414方面鉴于前几天的团派对414候选人的搞臭风和对414的攻击依旧不减，对这次选举进行抵制，没有派人参加。“会上，蒯先公布几天前早已定好的名单。蒯念名单，下面举手表决。开始一切很顺利，最不顺利也只要一两个人反对，以绝大多数通过。可表决到414的人时卡住了，汲鹏第一次表决没通过，老蒯二次再表决，才以大多数通过。当表决到孙怒涛、王良生时，一次、两次还是不通过。只好先靠边站。等到其他全通过后又来表决他们俩，可还是通不过。蒯急了，马上开“革筹小组”紧急会议，表示“革筹小组”同意通过，只有刘才堂反对。再在大会上表决，这才通过了。”由于我们都没参加这次选举会，写得如此绘声绘色的选举详情究竟如何我并不清楚。要是汲鹏、王良生以及我的通过都如此之艰难，沈如槐是折腾了几次才通过的？好像他连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根本就没提名？对于团派单方面搞的选举闹剧，此时我们已经不再感兴趣了。

两派签订《四项协议》以后，414是公开抵制，团派是实际违背，两派都没有遵守执行《四项协议》。414撕毁《四项协议》为团派的攻击提供了口实，团派违反《四项协议》的作为给414的分裂提供了借口。才几天功夫，《四项协议》已经名存实亡。刚调整扩大的“革筹小组”因414的不再参加而成了团派的一言堂。

这些天，鲍长康代表总部号召兵团上下“拿出十二分干劲，下定廿四分决心，充分运用‘四大’武器，昼夜奋战，分秒必争，全力以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一定要在5月30日前成立革委会”。陈继芳也发出了这样的誓言：“老子铁了心，5.30一定要成立革委会！”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4 1 4 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我们不再理会团派单独搞的革委会选举，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全部精力用于策划4 1 4 的独立，即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去。

## 第十节 “东方红战团”，4 1 4 独立的主发动机

“东方红战团”对于4 1 4 的出路，态度是很明确的。

派生于“八八”、“三纵队”的“东方红战团”，在政治观点、派别利益等方面与团派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从“井冈山兵团”成立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显示出离心的倾向。随着这阶段蒯大富的不断犯错误以及对4 1 4 的高压政策，“东方红战团”要与总部分庭抗礼的态势更加明显。即使冒着分裂的骂名和中央打棍子的风险也要坚决抵制团派独大的革委会，这是“东方红战团”的既定方针。当然，在步骤上，在策略上，“东方红战团”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到了5月底，“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们在圆明园废墟密谋，作出了“成立新的总部、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分裂的决策。”我对“八八”和对“井冈山”都是有感情的。如果一定要我在两者之间分个厚薄，在兵团成立之初，我对“井冈山”更有感情。只是，随着与蒯大富之间分歧的加大，我对总部的失望也多起来了，感情也逐渐疏远一些了，与“东方红战团”的关系则亲近起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与总部之间的矛盾没有像“东方红战团”与总部之间那么多、那么深。我乐于在兵团总部里面做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总部委员。在有些事情上我投反对票，在另一些事情上我也投赞同票。

随着争论的升级，我与总部的分歧越来越严重，这是事实。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脱离总部，要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去，要与总部分道扬镳，要与蒯大富正面对抗。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如果说，“东方红战团”是想把我从蒯大富营垒拉出去成为与团派对抗的同盟军的话，那么我更多的是想借助“东方红战团”这一外力逼着蒯大富认识错误、更弦改辙。

5月中旬，当“东方红战团”的一些重要人物频频向我吹风，说什么“只有经过分裂才能达到真正的联合”，我不仅没有这样的念头，对于这种歪理，心里还挺反感的。

这期间，“三七战团”开过好几次战斗组组长会议和全体会议，研讨过学校的形势和可能的结局，也谈到过“分裂”这样的话题。有主张不得已就分裂的，也有主张无论如何要避免分裂的。总的倾向性意见与我一样，都是主张能不分裂就尽可能不分裂。

一提到分裂，我就想起了张国焘。红军长征路上，张国焘仗着人多势众另立中央，公然分裂党。因此，张国焘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现在的情况当然不能做这样简单的类比。我可以辩解说自己是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不得不与错误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决裂。但是，归根到底是我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这总是一个客观事实。分裂，怎么说都是一件很难听的事情。谁都不愿意背上分裂的骂名和责任。难道我想做清华文革历史上张国焘那样的分裂主义分子吗？决不！

此外，4 1 4 与团派的矛盾难道真的尖锐到非得分裂就不能再往前走的地步了吗？我心存幻想，感觉好像还没有那样严重。

我当时是这样估量4 1 4 的两支中坚力量的：

“三七战团”，既没有搞分裂的心思，也没有搞分裂的魄力和能力。没有“东方红战团”，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与总部分裂的。有了“东方红战团”，在某种条件下，它可能会跟随着分裂。

“东方红战团”，不管有没有“三七战团”相随，它或迟或早都要从“井冈山兵团”中分裂出去的。没有“三七战团”，它分裂以后究竟会有多少4 1 4群众跟着“东方红战团”走，这样的分裂组织能生存多久，这些都是很难预料的。如果有“三七战团”一起参与分裂，那么成功的把握就大得多，分裂后生存的机会就多得多。

“东方红战团”这架动力强劲的发动机在分裂的道路上已经启动，我也走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前进还是后缩？一天比一天紧张的局势逼着我作出最终的抉择。

## 第十一节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最终抉择了分裂

前段时间，我无论与蒯大富怎么有分歧，闹矛盾，搞对立，那都是政治观点上的，并没有再上升到组织上的决裂。但是，随着形势的急剧发展，我知道我已经处在分裂还是不分裂的十字路口。

《四项协议》对我个人的最大影响，就是在方向的抉择上，我从不主张分裂偏向到了不得不分裂。

谢富治是那样的蛮横无理，连“正确”两个字都不允许加。团派承认4 1 4合法仅仅是改正错误，并非是实质性的让步。而承认4 1 4合法的目的只是为了赶快成立革委会这一功利目的，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从根本上改变对4 1 4的态度。搞臭风、攻击风就是明证。

如果不分裂，那以后“合伙”的日子怎么过？今天兵团总部、“革筹小组”的决议要无条件的执行，明天革委会的决议更得无条件的执行。要是不执行，罪名就更大了，那是抗拒红色政权的大罪，到时候动用专政机器实施镇压也是理由十足的。蒯大富对工作组的反抗是够坚定的，让我钦佩。蒯大富对唐伟的打击、对“八八”的否定、对“4 1 4是非法组织”的定性也够厉害的，让我害怕。他在这两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和手段，我都领教过了。

除了对今后形势的估量以外，在我思想的深处，还有一个对个人利益和命运的考虑和担心。很明显，我如果不走分裂的路，政治风险最小，政治利益最大。

政治风险：清华“井冈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蒯大富是全国闻名的学生领袖。他们在打倒刘少奇这一重大战役中立下了大功。因此，不仅得到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的支持，更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支持。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要与“井冈山”闹分裂，这不是明摆着把自己置于右倾的、分裂的位置上吗？置于与中央文革闹别扭的对立面上吗？我们这样做，肯定得不到上面的支持，也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同情。再说成立革委会，这大方向肯定没有错。外界不会理解4 1 4为什么要反对成立革委会，不会认同“两派分歧严重成立革委会的条件不成熟”这样的反对理由。外界所看到的就是4 1 4反对成立革委会，反对蒯大富。随便问一个路人选择支持蒯大富还是4 1 4，不见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支持蒯大富，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支持4 1 4。更何况，周恩来已经答应要来参加清华革委会的成立大会了。只要大会一开，他亲自一参加，也就等于承认了这个革委会，说明4 1 4反对成立革委会反对错了，是倒行逆施。接下来4 1 4如果不解散的话，蒯大富很可能把4 1 4重新定性成“非法组织”甚至反动组织，把4 1 4的主要头头都定性为坏头头。到那个时候，4 1 4的处境是非常凶险的，我们这些4 1 4坏头头的下场也是极其难看的。被抓起来，被判刑，这样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完全有可能的。

政治利益：我已经是兵团总部的核心委员，是“革筹小组”的四个副组长之一。尽管在革委会选举中被反复折腾了好几次，我知道那不过是团派的小伎俩而已。我肯定能参加革委会，而且风闻我是内定的四个革委会副主任之一。这个相当于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职位，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是令人炫目的。我也明白，在这个革委会里，我只是被团结的对象，只是用嘴皮子参政议政的一只花瓶而已。很有可能过不了几天，我又会被蒯大富当做右倾分子排挤出来，当做唐伟第二来打击。但是，在近期一段时间内，有虚名、无风险，还能满足一下虚荣心，这点大体上也是肯定的。

如果我不走分裂的路，政治风险最小，政治利益最大。但是，如果我害怕承担政治风险，却想着谋求最大的政治利益而放弃我的政治立场，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在老四眼里，我就是个背叛者；在老团眼里，我就是个投机者；而我对自我的评判则是一个变节者！

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在巨大的政治风险面前，每个人都有可能胆怯。在诱人的政治利益面前，每个人都有可能动摇。因为谁都有私心杂念，谁都有得失考虑。要说我没有想过自己的前途与命运，那是不真实的。

但是，影响一个人思想行为的，不仅仅只是趋利避害这一条。我，以及我们这一群人，在当时是把政治理念视为根本，把政治观点看得极重的人。就我的内心而言，我非常在乎坚持独立的政治见解。当捍卫我的政治观点与追求我的政治利益发生严重矛盾的时候，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我究竟选择什么？

那是一个“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年代。我们已经认准了我们是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也已经认准了蒯大富是在极左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我们要以一切力量和可能采取的办法进行抵制，即使上刀山下火海，有天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我想过政治风险和政治利益，但是没有因此而动摇过，我坚定地取义而舍利。

当沈如槐等人把“东方红战团”的决定告诉我，询问“三七战团”的态度时，我与汲鹏商量后，决心不再理会“三七战团”一部分成员的反对意见，决定以“三七战团”声明的形式支持“东方红战团”，一起与总部决裂！

我做出了我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政治决断。我很明白，这一决断不只是影响我一个人，也会影响到一大批414群众。不只是影响414的未来，也会影响清华文革的走向。

从这一时刻起，“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成为414这叶小舟的两架发动机，风雨同舟，休戚与共，迎着恶浪，奋力向前！

“三七战团”的坚决支持，我和汲鹏的明确表态，让沈如槐和“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们十分惊喜，他们一颗悬着心终于放了下来。

那几天，团派上下忙忙碌碌。彩旗插上了，标语挂起了，锣鼓备好了，请柬派送了，就等着5月30日良辰吉时一到，等着周恩来、谢富治等贵人主席台一坐，广播一响，口号一喊，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庆典就要开幕了。414知道团派全力以赴在做些什么，因为这是公开了的。团派是不是知道414暗地里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分裂？他们忙得晕头转向的，可能不是很清楚，也可能知道414的动向，但是没太放在心上。对于团派来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要革委会的大牌子一挂，无论414折腾出一个什么样的花样来也都无济于事了。

清华园中，团四逐鹿，究竟鹿死谁手？

水木湖畔，鱼死网破，到底谁笑最后？

谜底即将揭晓。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 年 2 月第一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